

珍藏手本



呦呦鹿鸣

燕国公主眼里的霸国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博物院
首都博物馆
编著

科学出版社



首都博物馆
CAPITAL MUSEUM, CHINA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博物院
首都博物馆
编著

呦呦鹿鸣

燕国公主眼里的霸国

珍藏手本

科学出版社
北京

首都博物馆 书库

丁种 第叁拾部

《呦呦鹿鸣——燕国公主眼里的霸国（珍藏手本）》

首都博物馆学术委员会
（首都博物馆书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郝东晨 郭小凌

常务副主任：黄雪寅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龙霄飞 冯 好 刘树林 孙五一
吴 明 武俊玲 武望婷 钟 梅
徐 伟 章文永 鲁晓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呦呦鹿鸣：燕国公主眼里的霸国：珍藏手本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首都博物馆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7

ISBN 978-7-03-041414-4

I. ①呦… II. ①山…②山…③首… III. ①周墓—出土文物—研究—翼城县—西周时代 IV. ①K878.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8174号

《呦呦鹿鸣——燕国公主眼里的霸国（珍藏手本）》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博物院 编

首都博物馆

考古发掘：谢尧亭 王金平 杨及耘 李永敏

展览大纲：谭晓玲

摄 影：厉晋春 秦 剑

责任编辑：范雯静 宋小军

特约编辑：杨 洋

责任校对：韩 杨

责任印制：赵德静

装帧设计：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出 版：科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 编：100717

发 行：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制：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2014年7月第1版

印 张：6

开 本：889×1194 1/16

定 价：6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引言

霸国是根据 2007—2011 年发掘被盗的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时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而确定的一个西周诸侯国。此前没有人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霸国，浩瀚的史书中没有留下关于它的只言片语，那么这个神秘的国家如何能够隐藏了近三千年而无人知晓？它又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存在了多长时间？它来源于哪里？最后又去了哪里？……太多的问题需要我们慢慢地去揭开她神秘的面纱。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也就是说从今天的 2014 年，往前追溯四千年，才到我们传世文献记载的夏朝，即公元前 21 世纪。那么我们从夏朝再往前追溯一千年，即公元前 31 世纪才能够得上五千年的文明。一般来说，严谨的学者将夏代及其以前都归为传说时代，而将商代后期发现甲骨文字以后的历史作为信史。为了给研究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创造条件，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后又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旨在通过多学科合作的手段主动探索、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而霸国的横空出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

历史背景

公元前 1000 年前，商王朝统治着中原大地，和它同时期并存的还有大量的国家。这些国家，有的是商王朝分派出去的贵族建立的据点，有的是与商王朝关系密切、结成联盟的方国，还有的方国时叛时服，更有一些方国与商王朝长期对抗。这些国族大都是从古代的部族发展过来的，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交通和通讯的落后，这些国族的生活方式与中原以农业为主的国族在经济形态、政治结构、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差异，中原国家往往将这些与其自身文化不同、经济形态有异的族群称为夷狄或戎狄。

总之，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分布着很多的族群或国家，具体数量已不可而知，单从后世文献记载来看大体上应有数千个这样的国族。

商代末年，商王纣征伐东方的部族过于频繁，导致老百姓怨声载道，兵士苦不堪言，国力大减。而西北方有戎狄等国族的不断侵扰，西土的周族实力渐强，周武王联合所谓的八百诸侯在商郊牧野一战消灭了商朝。周族或周邦，本是商王朝统治时期位于西方的一个小国家，文献上称为“小邦周”，其文化和经济较商王朝落后，但周族的首领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以新生力量摧枯拉朽、推陈出新，夺得中原领袖的大权，面对商王朝及其属国、方国等大片江山，周族统治者采取了封建诸侯的方式以“藩屏周室”，即保卫周王朝的江山。周王分封了儿子、兄弟或功勋卓著的大臣，建立了齐、鲁、燕、晋、郑、卫、荀、芮等诸侯国，还分封了先圣王尧舜及夏商的后代，同时还将商王朝原来的旧国重新分封，甚至将很多戎狄族群也进行了迁封，这样在周王朝统辖的区域内有 1700 多个分封国。这些分封国，说是国家，其实都不是很大，大者有方百里，中者有方五十里，小者有方三十里，也有更小的。当时的自然环境与今天不同，人口稀少，气候温暖，丛林茂密，道路交通也不像今天这样发达，因此，在一个区域中一般都会安排有一个大国作为区域的方伯国，这个方伯国一般不干涉其他小国的内政，各个国家一般都有相对独立的处理内政外交的主权，但是在给周王室缴纳贡赋和对抗非华夏戎狄族群战争方面要听从方伯国的组织和召唤，这个方伯相当于二级行政区官员，在某种程度上替周天子治理一方，但事实上他又没有多少实际的控制权，周天子可以越过他直接与小国对话或往来，这大概就是当时的政治体制。

西周时期特别是西周早中期周王室对诸侯国进行着有效的管控，管控的手段有分封、册命、朝聘、巡狩、征伐等，这些都通过“周礼”来规范，周礼相当于西周的法规。我们知道，在周王室的统治范围内，青铜器和玉器等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器形、纹饰、制法，这些器物的资源若非周王室直接控制，就会存在多种多样的风格，当然这种管控并不意味着所有青铜资源和玉器资源的原始加工和深度加工都要在周王室完成，比如铜矿的拣选、青铜的冶炼等都在矿料产地附近进行，甚至周王室也可以在青铜产地附近设置作坊进行铸造。目前所知西周时期的铸铜作坊在丰镐、周原和洛阳都有发现，其他封国也有少量陶范零星发现，似不足以说明其拥有铸铜工业，比如在横水墓地的墓葬中就发现过陶范，它作为随葬品出现在被盗掘的大墓之中，可能是赠送或外来之物，在天马一曲村

遗址 J7 区发现的陶范，其时代主要是春秋早期，有少量陶范《天马一曲村》作者认为可能为西周晚期之物，笔者在《天马一曲村》报告中没有找到发表的与陶范共存的陶器，而且这批陶范与西周晚期的青铜制品的风格也不符，因此这些陶范的年代可能也要晚到春秋早期。玉器资源也一样，从矿料的粗加工到玉器的深加工，从矿源到矿工和玉器工艺师都被周王室垄断，各个诸侯国家之所以能够拥有这些制品，一种方式是通过分封赐器，另一种方式是册命赐器，还有军功赐器、往来朝聘巡狩赐器，甚至通过赍赠、赠送、媵器等多种礼仪交流的方式来实现器物的流通，当然，还有一种主要的获取方式，就是诸侯国根据需要来订做，通过用海贝、马匹、丝帛等等价物品交换来获得，像原始瓷器、金器、海贝等物品都是外来品，这些东西当然不是订做的。西周的青铜器和玉器等资源都被周王室掌控着，一个国家拥有这些资源和财富的多少表明其国力强盛的程度，一个贵族拥有这些资源的多少则表明这个贵族地位和财富的拥有能力的程度，因此，这些用来表达财富、身份、地位的重要资源在礼制比较严格的西周社会周王室必须进行牢牢地把控，西周早中期周王室也完全具备这种条件和能力，到了西周晚期特别是春秋早期，随着王室的衰落，各诸侯国不再把天子太当一回事了，因此各地都纷纷筑炉起灶，铸铜治玉，各诸侯国的文化特色立即凸显了出来，这是西周与东周政治体制不同带来的直接后果。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又复习了一遍西周王室的课文，走了一遍西周王朝的老路，各诸侯国进行国内分封，到战国初年，“诸侯倒霉了，卿大夫起来了”。历史在西周和春秋两个时期以相似的版本不同的人物重新上演了一遍，只是大舞台换成了小舞台而已，让诸侯们重温了一遍周天子的悲剧，可见西周以来的分封制存在先天的弊端。著名的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认为封建有四次反动，一次是项羽的复辟，一次是刘邦的封建，一次是西晋的分封，一次是朱元璋的封建，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所以吕先生说“封建之反动，实至第四次而终”。

确认霸国

霸国是怎么确定的呢？换句话说，怎么知道这里有个国家叫霸国呢？“霸国”一词是 2007 年由我们大河口考古队根据出土青铜器铭文最先叫出来的。2007 年 5 月在位

于翼城县县城以东约6公里的大河口村北高地上发现盗墓，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2007年9月对这里正式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大河口墓地面积4万多平方米，埋葬有一千多座墓葬。在大河口2号墓中的一个铜甗的内壁残片上最先发现了青铜器铭文，内容是“唯正月初吉？伯作宝甗”，关键的是铭文“伯”前面的这一个字，我们都不认识。这个字左边是个木字旁，右边写得有点奇怪，查找相关字书也没能辨认出来。有人说我们考古工作者天天盼着出土的青铜器上有铭文，可真正发现了铭文，关键的字却又释读不出来。索性就先存疑，等更多的相关考古材料发现吧。到了1号墓随葬的青铜器暴露出来的时候，可想而知我们当时急迫的心情。在一件大鼎的内壁，我们发现了铸刻得很浅的“伯作宝鼎”四个字，只是这还无法解决关键性问题。不过我们由此知道这座墓葬的墓主人是伯一级的贵族，即国君或族长。使我们惊喜的是，在一个铜簋的盖子内面我们发现了铸造有“霸仲作旅彝”字样的铭文，我们知道，伯、仲、叔、季是排行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的意思，而这个“霸”字应该就是国名或族名了。毕竟此时我们的证据还很少。之后，我们又在一本字书中查到了一个“霸”字的下部的写法与2号墓铜甗上的那个释读不出的字十分相似，我们由此推测2号墓铭文的这个？伯应该是霸伯。

有意思的是，2号墓是一座女性的墓葬，却见有霸伯的铜甗，而没有见到与这位女性墓主有关的铭文。我们之所以判定2号墓墓主人是女性，主要是依据该墓随葬的物品，比如带梯形牌的串饰一般是女性的专有用品，另外就是没有随葬青铜兵器。像2号墓这样规模较大的墓葬如果是男性墓葬，在西周时期，不随葬兵器一般是不可能的事情。同样有意思的是，我们在1号墓葬中并没有见到一例带有“霸伯”铭文的青铜器，但这座墓葬却随葬了大量的青铜兵器，没有发现那种梯形牌的串饰，因此我们推断1号墓的墓主人是男性。同时我们在1号墓随葬的青铜器上还发现了“燕侯旨”的铭文，我们已知燕国在北京市房山区的琉璃河遗址，而大河口墓葬所处的这一地带绝不可能是北燕国的所在。因此我们就大胆地提出了“霸国”的发现。后来2009年大规模发掘的时候，在1017号墓的青铜器上发现了一个清晰的“霸”字，也进一步地印证了我们的推测。

霸氏归属

仅凭这个“霸”字就能称国吗？它会不会是晋国的一部分呢？其实，在此之前我们发掘绛县横水邰国墓地的时候，已经对类似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思考，绝不是贸然地、想当然地提出一个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热词。学术研究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它需要有长期的知识积累，特别是考古学，不仅需要一定知识的储备，还需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必备的理论修养。我们知道，绛县横水墓地发现了几十座大墓，其中还有三座带墓道的大墓，墓道在古代社会不是人们随便使用的东西，尤其是在礼制相对比较严格的西周，人们更不会随便使用。这些墓基本上都有独立陪葬的车马坑，大墓中大多随葬有丰富的青铜器、玉器等。从出土青铜器上铸造的铭文可以看出，邰国具有相对独立的外交和内政，它与周王室及其他国家有相互的往来关系，而且墓地的埋葬习俗显示他们的人群构成相对单纯，具有相对雄厚的实力。我们通过大河口墓地与曲沃县北赵村的晋侯墓地、绛县横水村的邰国墓地的对比，发现在这里有埋藏丰富且有超过晋侯墓随葬品的墓葬，这里的大墓也有独立的车马坑，在大墓中还随葬有原始瓷器、金器等珍贵的外来品，这些物品不是一般贵族可以拥有和随葬的奢侈品。综合以上多个方面的因素，我们才敢确定这里应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霸国。

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和专家认为“邰”和“霸”不是国家，他们认为邰和霸最有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怀姓九宗”中的两宗，也就是分赐给晋国的始祖唐叔虞的媿姓狄人。他们认为霸氏就是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也有专家提出邰和霸都是晋国的采邑。他们推论的基础之一是大河口墓地的霸氏在晋国国都的附近，二是这两个人群都是或可能都是媿姓，正好可以与文献所记的“怀姓九宗”联系起来，因为媿与怀本来是相通的字。乍一看，这个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作为晋国的一部分也颇为合理。其实不然，晋国分封时地方并不大，《史记·晋世家》记载为“方百里”，方百里的意思就是长百里、宽百里，古代的里比现在的里要小，当然分封的方百里绝对不会那么方正，但也不会漫无边际地大出很多。因为自原始社会以来，特别是新石器时代人群数量众多，从我国目前已知的各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即可窥见一斑。大禹会诸侯时万国林立，到商代还有几千个国家，周武王伐商时联合了八百诸侯会盟津，西周国家多至近两千个，可想而知，当时一个国家的面积和范围有多大。如果把邰、霸作为晋国的一部分，则已

超出“方百里”的范围了，更何况有几宗怀姓目前还没有发现。再者是在晋都翼，即天马一曲村遗址就发现有头向西的媿姓狄人的墓葬，其中也有贵族，这与《左传》上记载的“怀姓九宗”在翼都是相一致的。因此，笔者认为邰和霸应是拥有独立主权的小国，即便是像有些人提出的它们是附庸国，也必须承认它们是国。更何况西周时期的附庸国与后世的附庸国含义有很大的区别。

霸国与晋国为邻，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2002年在香港市场上发现了一件晋侯铜人，其胸腹部有铭文“惟五月，淮夷伐格，晋侯搏戎，获厥君冢师，侯扬王于兹”，晋侯铜人铭文的发现说明了晋救霸难。在曲村墓地 6197 号墓葬发现过一件霸伯簋，这座墓葬的墓主为女性，霸伯簋发现于这座女性墓葬中绝非偶然，因此有人推测这位女性来自霸国，是霸伯之女，她的丈夫是 6195 号墓主，这两座墓葬都是东西向墓葬，墓主头向东。我曾经研究认为曲村墓地头向东的贵族是土著唐人的后裔，当然唐人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人群，应是以祁姓唐人为主体的可能含有多个姓氏的族群集团，像祁姓范氏和嬴姓赵氏在晋国早期可能都属于唐人集团。这件霸伯簋可能是作为陪嫁的嫁妆埋葬到霸伯女儿的墓葬中。这说明晋、霸两国族通婚，霸女嫁给晋国的唐人贵族而不是嫁给晋国国君，当然我们不排除也有霸国公主嫁给晋侯的可能，从燕国公主嫁到霸国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只是目前还没有发现明确的证据而已。另外，传世的青铜器——柶生簋的铭文记述了柶生与格伯（即霸伯）以马匹换田地的故事，从铭末的族氏铭文看，柶生当是妘姓瑊人，柶生即柶的外甥，柶生的母亲是柶国人，柶生所在国与霸国为邻，若不排除妘姓瑊人是晋国人的一部分，那么柶生完全可能是晋国人，除非在霸国周围还存在一个瑊国。晋国和霸国的密切关系还体现在考古学文化间的一些相似点，例如车马坑都位于主墓以东，车马坑为东西方向，没有殉人和俯身葬，人骨的种群特征更为接近等。但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大河口墓地发现明确的与晋国有关的文物。

大河口墓地的青铜器铭文显示这里有一个霸氏族群，首领是霸伯。我们在大河口墓地看到更多的是周文化的影响和独立发展的印迹，它有独立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拥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它有自身的信仰意识，这样的族群就是西周的一个封国——霸国。笔者认为西周时期的采邑政治在各诸侯国是不存在的，那是东周时期发生在诸侯国的事实，因此，把霸国和柶国说成是晋国的采邑根本就是讲不通的，把这些小国说成是晋国的附庸国也没有什么道理。其实晋国作为晋南地区较大的侯国，可能是方伯国。

燕国公主

大河口 1 号墓中出土了多件与燕国有关的青铜器，其中有一件青铜卣的盖内和器内底铸造有相同的铭文“燕侯旨作妹妹宝尊彝”。燕侯旨是燕国的第二任国君，这件器物应是他为他的的小姑娘做的青铜宝卣。我们知道，以往发现的燕侯旨青铜器十分罕见，仅在日本和上海的博物馆有存，因此燕侯旨的青铜器十分珍贵，这件卣内还发现了成套的酒器七件，它们分别是大小各异的五件饮酒的觶，还有一件舀酒的斗和一件单把的小罐。这种形制的小罐，以往没有发现过，器身上有几何形的奇特的纹饰，从与其他器物一起发现于卣内的关系推测，这个小罐可能也是舀酒用的。但令人不解的是，它的把较宽，而且与器身间距较小，手指难以穿过，但它又不像是明器，难道就是手指捏在把的两侧边来使用？或者另有木制的柄嵌于鋈手内当做斗来使用？或者是用来饮酒用的？它的学名又叫什么呢？这些问题现在还回答不了。另一件器形和纹饰相同但略小的铜卣，由于盖子与器身锈在一起，还没有打开，但通过 X 射线拍摄可以看出，在这件卣内也有一套酒器。此外，在两件爵、一件尊和一件觚上也发现有与燕侯旨相关的铭文，这些发现大大地丰富了燕侯旨的青铜器，并且把燕国和霸国牵连到了一起，这在大河口墓地发现之前我们是不敢想象的。

关于燕侯旨是燕侯克的儿子还是弟弟，在史学界还没有定论。《史记·燕世家》说封召公奭于北燕，唐代司马贞的《索隐》认为召公奭并未就封，而是让其大儿子去代父就职，以其二儿子留在周王朝继召公奭之位。但文献中都没有记载其长子、次子的名字，而且《史记》对召公奭以下九世均没有记载，因此，燕侯克和旨的青铜器铭文至为珍贵。克和旨是两代燕侯没有问题，只是二人若是兄弟，则燕侯旨的小姑娘则是召公奭的妹妹；二人若是父子，旨的小姑娘则是召公奭的女儿。从大河口墓地 1 号墓的年代来看，似乎“姊妹”为召公奭的女儿、旨是克的儿子较为合理。从相关的青铜器铭文来看，“召伯父辛”应该指的就是燕侯克。1 号墓的年代为西周早中期之际，即昭王和穆王之际，而大部分青铜器包括燕侯旨的器物年代都在西周早期，只有个别青铜器形制指示的年代略晚，也就是说 1 号墓葬的墓主霸伯埋葬的时间在西周早中期之际。西周早期有 90 年左右，假如霸伯活了 60 岁，他 20 岁结婚，那么他结婚时应在西周早期成王和康王之际，这与燕侯旨等器物的年代大致是吻合的，作为召公奭的小女儿结婚的年龄也是可以讲得通的，

但若是召公奭的妹妹则显得有些滞碍不通了。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燕国的公主嫁到了霸国呢？首先我们确信霸国不是姬姓国家，主要原因是大河口墓地墓主头向以向西为主，还有很多腰坑与殉狗，当然有人认为霸就是格，霸为姑姓，有人认为是媿姓，以后者为主流意见。燕为姬姓，异姓通婚，是当时的常制，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在 1 号男性墓葬中出土了多件套燕国国君“旨”的青铜器，铭文中显示为燕侯旨为他的的小姑娘制作的卣、尊及燕侯旨作的爵和觚等。大量的燕侯作器埋藏在霸国国君墓葬中，这不是一般的助丧之器（赠赙）所能解释的，更不可能是分赐、掠夺得来的，赠送的唯一途径可能就是两国联姻，燕侯旨给他的“妹妹”（小姑娘）专门制作的青铜礼物，赠送而来。当然，这个赠送行为可能发生在结婚的时候，也可能发生在婚后某一时间，比如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喜事。反过来，如果不是燕国公主嫁到霸国，这种特殊铭文的成套青铜酒器应该很难流传到这个异族小国。所以，我们推断这两个国族联姻是可以令人信服的。但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或确认燕国公主的墓葬，一是因为大河口墓地还没有全部发掘，二是大河口墓葬极少见夫妻并穴合葬的现象，三是我们发现的女性大墓墓主族姓身份均没有铭文可以确定。例如大河口 2 号墓葬就是一座大墓，墓主为女性，但青铜甗上的铭文是“唯正月初吉格（霸）伯作宝甗”，未见与女性墓主有关的文字，同样在 1 号墓葬中也没有见到与霸伯夫人有直接关系的文字，比如族姓或名字，或她制作的器物。奇怪的是燕侯旨为其姑姑作的器物为什么不埋藏在他姑姑的墓葬中，而埋到了霸伯的墓葬中，而且燕侯旨为什么要给他的小姑娘赠送一批酒器而未见其他器物呢？难道说他的小姑娘喜欢饮酒不成？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在西周早期赠送酒器或者是一种礼仪，是否与谐音“久”字有关，表示长久之意，我们并不能确证，不管怎么说，燕国的这批青铜酒器一定有其特殊的含义。

如果说酒器在西周早期还占有一定重要地位的话，它们埋葬到国君霸伯的墓葬中而没有埋葬到其夫人燕国公主的墓葬中，可能更为合理，也更能使人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霸伯国君的地位显然要高于其夫人，而不像绛县横水西周墓地 1 号墓与 2 号墓那样，夫人的 1 号墓规模大、随葬器物丰富、级别较高，而柶伯的 2 号墓规模小、随葬器物少、级别不及其夫人。有人认为这可能与这位夫人的出身有一定关系，她来自毕国，因为毕公是西周王朝的重臣，这位毕国公主嫁到小国柶国，享有特别的荣宠。不过这种推测并不能使人信服，因为绛县横水西周墓地的另一位柶伯夫人还是周王的姐姐（王姊），

而她的墓葬在各方面似乎并没有超过伋伯。因此，笔者认为这位毕国公主嫁给伋伯以后，在一定时期曾经主持过伋国大政，拥有国家权柄，她极有可能当过伋国的国君，极有可能是目前所知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位女君主，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尽管伋国只是一个国，甚至有人认为可能是晋国的附庸。

在大河口 2002 号墓葬中发现了一套水器盘盃，这套水器上各铸有一长篇铭文，其中这件青铜盃的样式为鸟形盃，这种形制属于首次发现，在其背部有一个青铜链盖，盖内有 51 个字的铭文，内容讲的是“乞”这个人向主人发誓如何如何。从铭文自名为盘盃来看，我们确定这件青铜器为盃，同出的还有一件青铜盘，盘内也铸有一长篇铭文，内容也是说乞誓的事，其中多次提到霸姬，这位霸姬肯定是 2002 号墓主霸伯的夫人，她来自晋国还是燕国？抑或芮国等其他姬姓国家？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 2002 号墓主是一位男性，是一代霸伯，从霸伯与姬姓国家联姻来看，霸国的族姓一定不是姬姓。

漆木人俑

在 1 号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等贵重的文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件漆木人俑。这两个人俑可以说是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俑，事实上他们并非殉人的替代品，他们站立于墓主人的脚端方向椁室外面的二层台上，面朝向墓主人的方向，双手的姿势像是原来手里握持着什么东西，发掘时并未发现，重要的是两个人像的脚下各踩踏着一个漆木的乌龟，造型逼真，这种现象在以往似乎没有发现过。我们知道商周时期占卜经常用龟的腹甲和背甲，在有的大墓中还随葬有完整的龟甲，文献上记载为“宝龟”，由于这种动物的寿命比较长，古代的人一般认为它阅历丰富，具有某种先知先觉的神性，或具有通神的功能。既然两个漆木人像站立于乌龟之上，一定具有某种特殊的象征意义，应与当时人的宗教信仰有一定的关系。这两个人像或者就是通天地的巫觋，在两个人像的旁边随葬有其他的漆木器，可能都与这两个巫觋有关。把他们埋葬于霸国国君的墓葬中，就不能仅仅理解为陪葬的人俑，也许与接引墓主的灵魂升天有关，或者具有佑护墓主攘除其他鬼神干扰的作用，或者具有其他的意义，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在大河口墓地没有发现一个殉人，这与绛县横水墓地发现大量殉人的现象截然不同，殉人是一种原始野蛮的宗教信仰的表现，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特别是商代广泛流行，但周人普遍不使用殉人，这反映了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河口墓地霸国人群受周文化影响或更强烈，文化习俗上部分有别于绛县横水西周邰国墓地。殉人这种陋习沿用时期较长，流行范围较广，像三晋的赵国就流行这种习俗，太原发现的春秋战国之际的赵卿墓就殉葬了四个人，长子县牛家坡 7 号战国墓也殉葬了三个人，春秋晚期秦国的秦景公大墓中殉葬了一百数十人，侯马乔村战国中晚期围沟墓中也发现有大量殉人，到了秦汉时期，殉人恶习才逐渐销声匿迹，更多的是用陶制的人俑代替了活人，这应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进步。在当时当地，给墓主殉人一定有其合理的一套说辞，具有不可抗拒的必然的理由，在一定程度上殉人这种现象与人群或主体人群推行的文化价值观有关，长期存在并根深蒂固的原因是某种文化价值观的束缚与禁锢，大河口墓地不殉葬人这种现象就说明它与横水邰国墓地在宗教信仰观念上具有很大差异。

另外，在 1 号墓葬中还发现了大量的漆木器、原始瓷器，这些物品大多放置在墓壁掏挖的土龕中，共发现了 11 个壁龕，一座墓葬中有这么多的壁龕在西周考古上是第一次发现。近年在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中也发现了多个壁龕，但其中放置的多为青铜器，与大河口西周墓葬不同，大河口 1 号墓的青铜器比较集中地见于墓主头前面的棺和椁之间，根据塌落的情况推测当时器物应是放在木架子上的。其实有多个壁龕的墓葬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墓中早就发现过。

霸国葬俗

大河口墓地的墓葬方向绝大多数是东西向，墓主头向以西向为主，少量头向东，仅有 4 座头向北的南北向墓葬。大墓墓主均是头向西，可见头向西的墓主人是河口墓地的主体人群，那么他们的头向西与头向北有什么特别的不同或者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为什么大河口墓葬主要是头向西的人埋葬在这里呢？或者说他们为什么要头向西方埋葬呢？埋葬人的时候头向朝哪一个方向，最初肯定是有讲究的，不是随随便便

挖个坑埋葬就了事的。自从新石器时代人类认识到主动处理尸体的埋葬方式以来，墓葬方向和墓主人的头向就有一定的含义，而且不同的人群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当时人们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已很难知晓。但我们通过考古发掘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群具有相同、相似、不同的埋葬头向，即便是相同的头向在不同的人群中也未必具有相同的含义。我们根据东周或汉代的文献和后代注疏知道，头向北的原因是古人认为北方是灵魂所归宿的幽冥之地，那么头向西与向东又怎么解释呢？大家有多种猜测，有人认为某方向是其族群起源之地或祖先所在地，有人认为是灵魂的归宿地，当然也有人认为与山水地理等环境有关，但在横水、大河口和北赵几个大墓地都具有北方为山、南方为水的地貌特征，墓主头向却并不全同，即使是在同一墓地也存在各种不同的方向，这恐怕是不能用地貌特征的理由所能解释的。我们知道风水的观念是后来才有的，西周时期并没有成熟的风水理论，当然周代埋葬也需要“筮宅”，即在这规划的公共墓地中，在其家族的范围内找到其最佳的墓位。虽然我们已经研究出大河口墓地头向的不同具有划分人群的意义，但头向表示的具体含义还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比如搞清这些人群的迁徙和源流关系，对于探讨其头向的象征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在大河口墓地的国君夫妇并没有埋葬在一起，既不同穴合葬，也不异穴并列合葬，或者叫做并穴合葬，俗称“对子墓”，这与同时期的曲沃县北赵晋侯墓地的晋侯夫妇墓葬、曲沃县曲村墓地贵族夫妇的墓葬，以及绛县横水邰国墓地的邰伯夫妇墓葬等大不相同，在大河口墓地较难以确定国君霸伯与其夫人的对应关系。

大河口墓地的所有墓葬都没有发现墓道，都是竖穴土坑墓。我们知道在安阳殷墟发现的商代王陵有带四条墓道的，也有带两条墓道的，西周的王陵虽然还没有发现或确定，但周原周公庙的墓葬就带有四条墓道，显然其墓主的身份和地位是很高的，可惜这个大墓被盗惨重，没有发现明确的可判明墓主人的信息，不过大多数学者推测墓主人可能是周公。当然在燕国的琉璃河墓地也发现了一座带四条墓道的墓葬，不过这四条墓道开在墓口的四角，并且都比较狭窄，显然其象征意义大于实用意义，或与“召公建燕”的规制有关？带两条或一条墓道的墓葬在西周各诸侯国墓地比较多见，像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晋侯墓地的绝大多数墓葬就带有一条或两条墓道，在山西省绛县横水邰国墓地共发现了三座带一条墓道的墓葬。但在时代略晚的河南省三门峡市的虢国墓地没有发现一座带墓道的墓葬，说明墓道这种埋葬形式并不普遍，不见得各国高级贵族都一定使用。但

凡是带墓道的墓葬一定是级别较高的贵族，问题是有些高级贵族为什么不使用墓道这种埋葬形式呢？虢国君主没有，霸国君主没有，偃国大部分君主没有，卫国君主也没有，可见墓道也不是高级贵族墓葬的必备之物，没有墓道的大墓其身份地位未必就低于带墓道者。使用不使用墓道与下葬方式有关？还是与信仰意识有关？或者与别的什么东西有关？在历史文献记载中墓道又称为羨道，被解释为下葬棺槨葬具使用的通道，我们已知的西周墓道有斜坡式和台阶式两种，而且我们知道西周偏早期的墓道坡度较缓，偏晚期的墓道坡度较陡，也就是说，偏早期的墓道距墓室底部较远，偏晚期的墓道距墓室底部较近，很明显其实用的理由是存在的。在大河口 1 号墓墓口四角发现四个斜洞，没有墓道，在横水偃国墓地也有这种现象，这些带有斜洞的墓葬年代也都属于西周偏早期，它们的墓葬体量较大，墓主身份地位较高。在湖北随州叶家山虽然发现一座墓葬既有斜洞也有墓道，但墓道不具有实用性，现在大家普遍认为这些斜洞与墓主的下葬存在必然的联系。只是西周时期在各地发现的高级贵族墓葬不都设有斜洞或墓道，也就是说大部分高级贵族墓葬既没有斜洞，也没有墓道，这些墓葬的下葬为什么没有使用这些特殊的设施呢？像三门峡虢国墓地和浚县辛村卫国墓地的高级贵族墓葬就是这样，这可能与各地的埋葬方式不同有关。与西周时期各国的信仰习俗没有多大关系，墓道或斜洞的有无与礼制也没有必然的绝对的关系，但一般的中小型墓葬是绝对没有这些设施的。

在大河口墓地目前只发现 1 号墓葬有斜洞，其他所有大中小型墓葬都没有发现这种设施，这座墓葬是目前大河口墓地所发现的大型墓葬中年代最早的一座。当然大河口墓地还没有全部发掘，我们不排除比 1 号墓更早的或同时期的大墓中也存在斜洞。斜洞的设置与下葬方式有关，但斜洞究竟是如何使用的我们并没有具体可靠的证据来说明，而且为什么斜洞到后期又废弃不用了呢？像大河口 1017 号大墓和 2002 号大墓既没有斜洞也没有墓道，之后的其他大墓也没有，这可能与大河口墓地埋葬方式的改变有很大关系。从目前所见到的材料来看，这种埋葬方式的变革时间是在西周早中期之际，而曲沃县的北赵晋侯墓地从早期到晚期大都使用墓道，没有发现斜洞，不存在这种变革，虢国和卫国墓地既无斜洞又无墓道，当然也不存在这种变革，可见这种埋葬方式的使用和变革也不存在普遍性。

大河口墓地墓主人的埋葬姿势以仰身直肢为主要葬式，没有发现俯身葬，在绛县横水偃国墓地有大量的俯身葬，甚至连 2 号墓主偃伯都是俯身葬。我们知道，俯身葬在

商文化中比较流行，等级高下不同的人群都有这种现象存在，具有某种特殊的象征意义，这说明大河口墓地人群没有这种特殊含义的信仰意识，这与天马—曲村的北赵晋侯墓地和曲村墓地是一致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河口人群的特殊性，他们与横水墓地人群的埋葬习俗差异其实还是相当大的。

大河口墓地流行腰坑和殉狗，腰坑中殉狗应该是墓主人下葬前的一种祭奠行为，这种古老的埋葬习俗也与当时人们的信仰有关。在姬姓周人的墓葬中几乎没有发现过腰坑，这说明姬姓周人不使用这种习俗，没有这种信仰。在商文化系统墓葬中腰坑多有发现，但腰坑不是判断商人及其后裔的唯一标准，我们知道，尽管商文化流行腰坑，并不排除其他人群和文化也有这种信仰，因为腰坑并非商人的专利，并且这种习俗在新石器时代早就存在，并非商人的发明。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腰坑的有无来确定是否是商人或商遗民，充其量腰坑是判断商人或商遗民的因素之一，而不能作为要素或唯一因素。周人为什么一般不用殉人，也不使用腰坑，与商人的信仰大不相同呢？这是因为商人迷信鬼神，而周人则要理性得多，不迷信鬼神，“敬天保民”，“敬鬼神而远之”，礼制上更多表达的是重视生者的社会规范，即便是丧葬，也是强调其为践行礼制的重要场合，所谓“序尊卑，别贵贱”，其目的更多的是做给活人看的，大家在这种礼仪活动中，进一步学习或重温了需要遵守的礼仪和规范，不断强化这套行为规则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把礼制与日常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周人的意识形态更务实，更注重人或者生命，而不是像商人那样，大事小事都占卜询问鬼神，把神鬼的力量过分地夸张，而对生命不够尊重。殉人和殉狗都是一种具象的思想观念或迷信意识在作祟，这些文化现象充分反映出周人与商人在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巨大差异。

霸国辉煌

大河口墓地大墓的墓主是霸国国君霸伯，霸伯的墓葬目前可以确定的有6座，从1号、1017号、2002号等大墓来看，霸国国君曾经也是一代的雄主。虽然霸国不如晋国强大，但墓葬中的随葬器物显示出霸国君主并不是一般的普通贵族，如在1号墓随葬的青铜礼器就70余件，仅青铜鼎就有24件之多，有方鼎有圆鼎，还有大量的其他食器、酒器、

水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品类齐全，内容丰富，还有大量精美的玉器、罕见的漆木器、珍稀的原始瓷器、较多的特殊陶器和其他器物，尤其是还有一件黄金含量很高的金器。器物多得在椁室放不下，在二层台上放不下，又在墓壁上掏了11个壁龛，塞得整个墓室满满当当。1017号墓主椁室中也出土了60余件青铜礼器，13件青铜鼎中仅方鼎就有5件，还有大量的酒器和3件青铜编钟，也是各种类青铜器齐备，其随葬的约两万海贝铺在棺盖板上。2002号墓相比之下要逊色许多，墓主器物少，只有3件青铜鼎，各种器类齐全，但总量要少得多。在墓地中部偏北还发掘了一座被严重盗掘的6022号墓，在其盗洞填土中还发现有车马器、玉器和一件金璜。从整个墓地来看，西周早中期是霸国的兴盛时期，国力强盛，霸伯也威风一时，到西周中后期就开始衰落了，直到春秋早期被晋国兼并。虽然一代雄主的霸国梦没能延续下去，但我们从中可以窥见霸国建国初期霸伯的雄心气魄，可以看到他们励精图治的伟大梦想，他们拥有或赐或置的青铜重器、玉器，拥有外来的原始瓷器、海贝和黄金制品，拥有战车与战马，拥有兵器与军队。由此可见霸国曾经辉煌过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霸国把控着浍河上游的大片土地，选择在这里作为建都之地，主要原因可能是国防的需要。当时的浍河水较现在要大得多，霸国都城可能就建在墓地西南，我们对墓地周围数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地毯式的系统调查，因晚期严重破坏，虽然发现了西周遗址，但并没有发现城垣夯土等遗迹。从大河口墓地的墓葬数量推断，当时大河口的人口并不多，充其量不过是数百人的聚落，但他统辖着一定的区域，这个统辖区域有多大？根据东周及以后的文献记载，我们推测其国土面积方五十里或三十里，属于小国。西周时期小国林立，它们有自治权，属于相对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独立主权，但它又受周王室的册命和管辖，而且在地区事务中又要接受方伯大国的统一组织管理，因此霸国实际上属于二等小国。在周边是否还有像邰国、霸国这样的小国呢？答案是肯定的，像有文献记载的祖国就在晋南，后被晋献公灭亡，这个国家也是狄人之国。近年我们在绛县县城以东的睢村发现一处被盗的西周墓地，考古勘探的结果表明，这里也是一处主要由东西向墓葬组成的墓地，类似的小国家今后还会不断地被发现。

大河口墓地的小墓有可以早到西周早期的，早期大墓还没有发现，1号大墓虽然器物大多属于早期，但埋葬时间应在早中期之际，说明墓主的生活年代大多处在早期，墓